

剑川人士在昆明留下的一些痕迹

□ 杨庆春

剑川县是以白族为主的一个滇西边远小县,海拔高,气候冷,生产生活相对落后。可是剑川县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文气迭起,名家辈出,就在近代云南省城昆明,剑川的优秀人士还是留下了一些有影响和值得骄傲的事情。

一、以大观楼长联书法为代表的墨宝和楹联

赵藩(1851年至1927年),云南省剑川人,白族。赵藩最为后人称道、影响也极大极远之事,就是重书了昆明大观楼长联。一八八八年夏历八月二十五日,是云贵总督岑毓英六十大寿生日。之前岑毓英的幕僚赵藩就建议“重立重刻重立大观楼长联”。岑毓英同意并命赵藩代笔书写,故长联上只写了“昆明孙髯翁旧句”(作者)、“西林岑毓英重立”(修复制作),没有署名是赵藩书写的。赵藩的“长联”书法家颜真卿、钱南园,长联结构稳健、笔画严谨、圆润有力、端庄丰厚,为其平生书法佳作,书写时年仅38岁。一百多年来,以岑毓英名义重立,而赵藩亲笔书写的大观楼长联,由于长联本身的价值与书法价值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名满天下、泽及后世。除大观楼长联的书法以外,赵藩在昆明西山、筲竹寺等名胜景观还留下了许多的书法墨宝和楹联作品,供后人欣赏、品味和思考。

周钟岳(1876年至1955年),云南省剑川人,白族。云南重九起义后,曾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云南省省长等

职。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云南光复。云南都督府由原来的云贵总督府(今胜利堂)迁到了五华山办公,五华山便成为了滇省政治中心。为了纪念云南光复,云南都督蔡锷在此扩建了办公大楼,并改称为“光复楼”,以彰显革命之功绩。应蔡锷邀请,周钟岳书写了“光复楼”三个擎寰大字,悬挂楼头,以壮声威。周钟岳在昆明有影响的书法作品还有代龙云书写的云南石林的“石林”两个大字和云南大学的“仰止楼”匾额等。

赵式铭(1873年至1942年)字星海,白族,云南省剑川人,曾任云南通志馆馆长等职。1935年,昆明在圆通山修建“聂耳亭”,赵式铭书写了三副对联:(一)“古乐惜无传,我亦雅琴龙德裔;修门嗟不入,君真湛石屈原流。”(二)“乐府近凋零,学就成连人已逝;吹台遥怅望,化为精卫客应归。”(三)“酒罢客将归,一阁嵯峨斜照紫;曲终人不见,数峰苍翠暮烟青。”第一联将聂耳与屈原相比,把聂耳之死看作祖国巨大损失。第二联悼念聂耳正在音乐上大有成就之时不幸去世,人民临海遥望,祈盼音乐家的英灵化为精卫鸟,飞回祖国,为抗日救亡而歌唱。第三联将聂耳中永峙山峰,喻作聂耳光辉生命,烦添无限追思敬仰之情。

二、设计重修忠爱坊和金马、碧鸡坊

“丽江耙耙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

有。”这是流传在滇西北地区的一句民谣,真实地反映了剑川木匠遍布省内外客观实际。就从剑川人设计重修昆明忠爱坊和金马、碧鸡坊来看,足以充分印证了剑川木雕影响的久远、广泛。

据张笑《剑川木雕》一书中说: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昆明重修三市街忠爱坊,专请剑川人张锡鹏设计制作牌坊,并要求将斗拱梁枋雕刻成云南一流水平。张锡鹏根据牌坊位置和牌坊“忠于君而爱于民”的含义,认真设计了相并图案,受到了三迤民众的称赞。1914年,忠爱坊附近油蜡铺失火,使忠爱坊又毁于火。1999年,以忠于国家、民族团结、造福于民为象征的忠爱坊重建完工,坊上“忠爱”两字,原为沐英手迹,后来失传,今无可寻,后拓赵藩字迹,予以弥补。

金马、碧鸡二坊曾经是昆明的象征和标志之一,与忠爱坊鼎足而立形成“品”字三坊。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昆明邀请张锡鹏来昆明重修金马碧鸡坊。其时张锡鹏因病不能再上昆明,他推荐了剑川同行木匠杨文樾,又使一位剑川木匠在昆明显示了剑川木匠的独特手法和精美工艺水平。当时原来的金马碧鸡坊已经毁坏日久,昆明人只对两座牌坊有一个粗略的记忆。杨文樾多次踏勘,并立木标记,反复验证,最后确定金马、碧鸡二坊牌楼的尺度,设计成功了一高一低飞檐翘角的金马碧鸡坊,使数学、光学、天文学、建筑学紧密结合起来,既具有历史文物性,又具

有艺术代表性。建筑成功的金马碧鸡坊在当时昆明最为繁荣的金碧路上,充分显示了剑川木雕精美大方、厚重庄实的艺术风格,为昆明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进一步扩大了剑川木雕的影响。文革期间,金马碧鸡坊被人拆除了,“金马碧鸡荡销尽,千载胜迹无处寻”。1998年,昆明市人民政府重建金马碧鸡坊时,剑川人又承包了牌坊上仿古建筑木雕部分,还承包了广场南侧的众多仿古建筑院落。新一代的剑川木雕师傅按质按量地完成了仿古构件的全部制作和彩饰工程,又一次受到了春城人民的称赞。

三、云南高等林业教育的创始人也是剑川人士

张海秋(1891年至1972年),云南省剑川人,白族,著名林学家、林业教育家。1913年春,考取云南留日预备班,赴日本留学。1915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学系,1918年毕业。回国后加入中华农学会和中华林学会,先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专门学校、江西农业专门学校、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1939年秋,应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历任云南大学森林系主任、农学院院长等职。1950年以后,任云南大学校务执行委员会委员、农学院院长、昆明林学院教授等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国内缺乏林业方面的资料和林业方面的教材,他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中,亲自编写教

材。张海秋毕生从事农林教育工作,不仅是云南高等林业教育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林业教育的先驱者之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张海秋应聘云南大学后,为开创我省的农林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辛勤操劳。1939年,他创办了农学院森林系,任系主任。1943年春,张海秋任农学院院长,创办农林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农林专业人才和教育、科学工作者。张海秋办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注意教育与建设结合。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建立了约260亩的呈贡农林场,约50亩的云大经济林场(后改为实验农场)、昆明北门外作物实验场、弥勒木棉场、昆明厂口林场和实习蚕桑场等实验基地。这些教学实验基地除供引种栽培、实习实验之用外,还生产部分农副产品投放市场,收入作为扩大再生产和添置教学仪器设备等开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物资困难和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云南大学森林系的创办和农学院的扩充,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高等农林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主要参考书目:1、《剑川县文史资料》,剑川县政协编;2、《剑川县志》,剑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云南民族出版社;3、《剑川木雕》,张笑著,云南大学出版社;4、《昆明风物志》,李孝友编著;云南民族出版社;5、《新编昆明风物志》,朱净宇撰稿,云南人民出版社。

担当与祥云水目山

□ 胡子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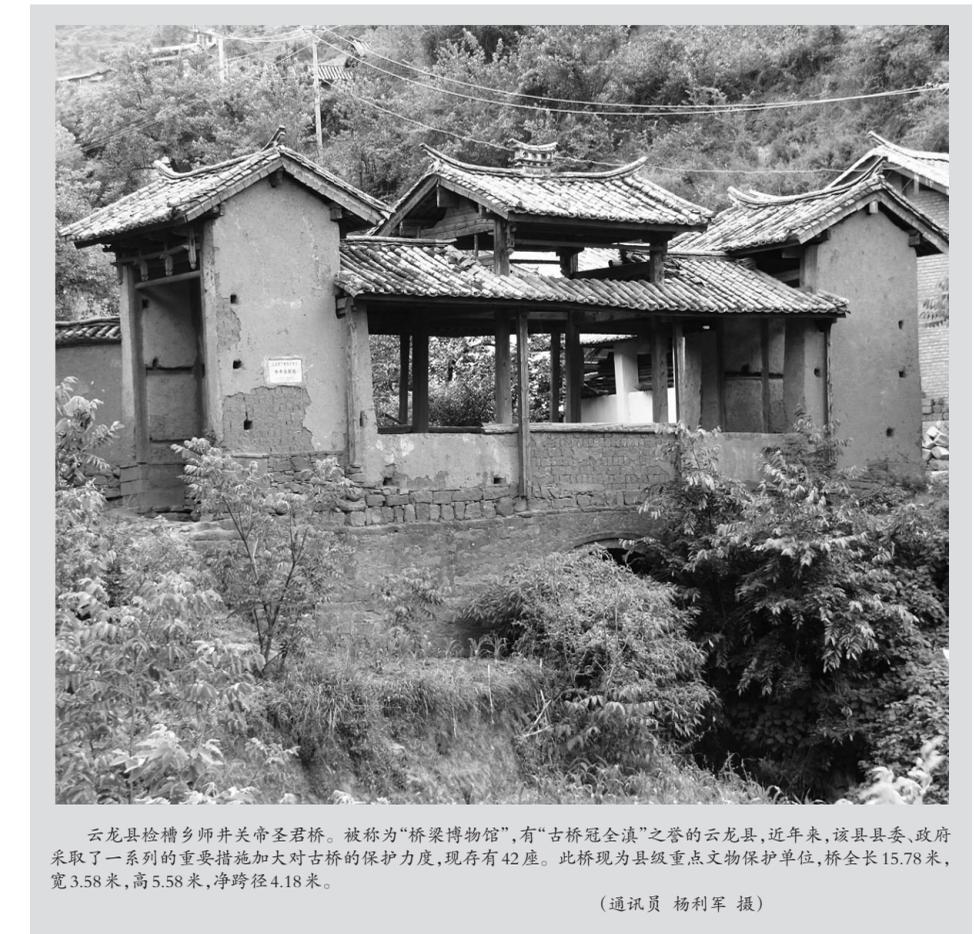
在祥云水目山的大德高僧中,担当以卓越的诗书画成就名噪海内外,不仅是中国僧界的一绝,也是古今公认的中国诗书画界的大师。他众多的诗书画作品,堪称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倍受古今赞赏喜爱。水目山作为担当和尚出家修行的第一站,在水目山修行时期,他不仅静心修佛成了大德高僧,也将自己的诗书画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因之有了更为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作为一个集诗书画艺术于一身的他在云南横空出现,使一直寂寥于中国诗书画界的云南陡然间有了引世人瞩目的文化艺术亮色。而作为水目山上的一代高僧,水目山成就了担当,担当也精彩了水目山这座滇西佛教名山。

担当,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生于云南滇池地区的晋宁一个有着诗书传统的文人家,取名唐泰。祖父是嘉靖年间的解元,著有《五龙山人诗文集》三十余卷。父亲也有诗著《十海诗集》,自小便接受父祖在诗书艺术上的熏陶,加上他聪慧颖异,十岁就能行诗作文。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12岁的唐泰随父亲北上到金陵(今南京),在接触当地诗家书人的过程中,以其之诗书画灵气,在金陵初露头角,“诗名浮动”,成为小有名气的少年诗书画家。从大约是1610年起,唐泰晋宁家中,直到成年时期的33岁上,才又重新出滇,入京应礼部试。但未能金榜题名。正是仕途不运,进一步激发了他的诗书画兴趣,并在其地拜师习诗书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631年,年近四十的他回到了云南,又一次借居晋宁老家,烹汤递水,奉养老母。这期间,大旅游家徐霞客游遍天下来到了云南,入晋宁地览览山水。唐泰与之相识,两人心有灵犀一见如故,月光清茶吟诗作赋,成为莫逆好友。后母辞世,从此了无牵挂的唐泰,东西纵贯大半个云南,来到了慕名已久的祥云水目山,剃度出家,拜于水目高僧无住座下,从此开始了长达32年的青灯黄卷的修行生涯。他先取僧名普荷,后又更僧名为通荷,另有担当之号。普荷担当于水目佛地成为一代高僧。其间虽也历游省内各

幽山名寺,广交高僧名士,但水目山始终是他出家修行前期的最主要佛地,并在这里从一个普通的僧人修成大德高僧。在水目山成就僧名后,又才辗转宾川鸡足山,大理感通寺,于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在点苍山佛顶峰麓的感通寺坐化,享年81高龄,徒弟广厦为其筑建灵塔于感通寺,灵骨长伴银苍玉洱。

作为一代大诗人,担当在出家前,就有诗集《脩园集》。出家后,成《慨庵草》。邱宣充先生主编的《水目山志》,收录其诗联428首(幅)。虽未必完整,却是其代表作。通过这些诗联可以看出,其所创作的诗中,多为二行诗,既是诗,又为联,诗性融于联体,联韵渗入诗行,独显风格,自成一格。诗歌语意多显禅景禅意,朴素直白但饱蕴哲理,似随意之言却又暗含锋机。往往短短的两行诗中,峰回路回,不尽千秋,让人读之如咀嚼霜染过的橄榄,回味无穷,达到了非常高的诗联艺术水平。与他的诗联相媲美的,是他的书法和墨画。担当的画以山水画为主,兼有少量的人物画。他对于自己的画,有过这样的表白:“老笔尖尖无墨水,要从白云想鸿蒙。”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的画无丝毫刻意的痕迹,信手画来,以神似而超形似,狂达豪放,恣意汪洋却又没有任何肆意泛滥的痕迹,把一个境界艺术家复杂微妙的审美心理和高古清远的思想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欣赏他的画,欣赏者往往见景不见纸,见物不见墨,最后是见灵动的情感思绪和逸飞的精神内涵而不见线条。这一点,在他的同时作为一个书法大家那“当其下风雨疾,笔所未到气已吞”的狂草中可以看出得出来。

担当在水目山从一个普通的僧人而修行成了一个大德高僧。也是在水目山,把自己所喜爱的诗书画一推举上了个人的艺术巅峰,使当时在文学艺术上相对沉寂的边地云南,出人意料地向中国的艺术天空飘出苍劲茂盛的一枝。在这个意义上,祥云的“水目山成就了他”,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祥云的“水目山”。



云龙县检槽乡井关帝圣君桥。被称为“桥梁博物馆”,有“古桥冠全滇”之誉的云龙县,近年来,该县县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加大对古桥的保护力度,现存有42座。此桥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桥全长15.78米,宽3.58米,高5.58米,净跨径4.18米。(通讯员 杨利军 摄)

永平古驿县衙初考

□ 张会军

鹤庆县政协重视文史工作

近年来,鹤庆县政协高度重视文史工作,充分发挥文史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开创性地开展工作显成效。

鹤庆县政协立足鹤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大理州的文献名邦的实际,抓重点、重特色、出精品,注重抢救与存真,将征集史料与参政议政结合起来,整理出版了一系列的文史读物,用生动的史实教育人、团结人、鼓舞人。近年来,先后出版了《鹤庆县政协志》、《龙华山志》、《鹤庆文史资料》第八、九、十辑、《鹤庆委员风采》、《鹤庆传统民歌集》、《优化社会细胞·促进社会和谐——鹤庆》、《幸福度过更年期》、《鹤庆政协》第1至7期、《鹤庆》杂志政协专刊、《鹤庆新闻通讯》(德馨桑梓·助力鹤庆)专刊、《鹤庆风光》碟片等。

鹤庆县政协十分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使一些县内文物古迹得到很好的保护。多年来,县政协紧紧围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

方针,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认真督办政协委员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提案,使全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成效。如章天柱、杜宽活、段天禄等政协委员提交的关于对松桂茶马古道遗址、老县城古民居等12件文物古迹保护的提案,县政协及时交给相关部门办理,同时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朝霞寺、菩提寺、龙华山、象眠山古墓场、云鹤楼等地对文物古迹进行视察,形成调研报告,交由相关部门处理,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将这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古迹修缮一新,得到很好的保护。

鹤庆县政协还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推动了鹤庆文学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近年来,县政协倾力支持、资助县内广大文学爱好者出版个人专辑20多本(集),这些文集的出版,对鹤庆存史、资政、育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鹤庆文学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

(特约记者 张银奎)

永平的历史文化离不开博南镇,博南镇的历史文化又以花桥村最为悠久、丰厚。作为西南丝绸之路“博南古道”,已有着二千多年的历史。远在西汉时期,这条古道即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军事通道、民间商道,由此可达印度、阿富汗等西亚诸国,除了军事目的外,还可运送布匹、食盐、百货等前往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

东汉王朝为开发永昌郡,广征民工大规模修筑博南道,云南永平县花桥村成了博南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因当时森林茂密山上到处都有凶猛野兽出没来伤及路人,任何一个过路的马帮或客商,只要过了响午就必须在此吃饭歇息,否则是没有能力、体力翻越艰险的博南山和渡过天险兰津渡。所以,花桥逐渐成了一个有县城级别的繁华驿站。

据当地老年人的讲述,当年花桥古镇,整条街全长600多米,青一色的麻花巨石铺就的路面,中间全是青石板把街道分成两瓣鹅卵石铺就的路,由东向西把古镇一分为二,正中间设有一道城墙牙门相隔开来。古镇有自己的“街天”,街天就设在博南古道穿镇而过的这一段青石巷道上,从那时候起就把每逢逢、马日子就定为“赶集日”一直延续至今。那时候赶集的客商主要来自保山、厂街、曲阴、杉阳的商人,前来赶集的有1000余人,街天主要以卖布匹、食盐、土杂百货、洋火、洋伞等商品。当时

房屋多是土木院落杂沓交织。那时候花桥村仅大马店就有6家,大小杂货店有20多家,大马店每家能歇六七十匹马,饭店也有10余家,街坊还开设有一家吸烟馆并设赌场。每天下午,都会有成群结队的马帮,赶着黄牛者在这里歇脚,其中一部分是客商贩卖的黄牛,一部分是马匹不够用来驮货物的黄牛。太阳落山时歇息。而黄昏,歇脚的马匹和货物,再一次摆满了花桥街,抬人的滑竿也摆了一长溜。踩蹄声,嘶鸣声,赶马人的吆喝声,店铺里的猜拳行令声,使得花桥街热闹非常。

走进这座古老的驿站,从遥远的地方蜿蜒而来的马帮,在花桥古驿住宿一宿后,穿过花桥古驿的青石路又逶迤而去,渐渐消失在茫茫的群山和云海之间。花桥村委员会附近,现存少部分显得十分陈旧而萧条的铺面和街心中的青石路,依稀可见的马蹄印仿佛在印证着那段已消失的历史。

多少年来,途经花桥古驿的商贾马帮络绎不绝,过往客商熙熙攘攘,格外热闹和繁忙,大大小小的马店曾经发展到三十多家,无愧是西南丝绸之路博南古道段漂泊的马帮的家园。在当地老年人心目中,最难以忘却的是“马帮文化”。傍晚,伴随着落日的光辉,一队队马帮在叮当作响的马铃声中,进驻这座古老的驿站。天还未黑,客房就住满了南来北往的赶马人,他们虽然已经

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了一整天,仍饶有兴致地聚集在一起,一面喝着香喷喷的烤茶,一面吹嘘着各自在路上的见闻和奇遇,奔走了一天的骡马大口大口地咀嚼着草料,不时地打着响鼻。迎着次日的黎明,在一片吆喝声中,一批批驮着各种物资的马队又匆匆奔向远方。

如今,交通发达,马帮少见,但马蹄印依然,古驿站、古铺面残存可寻,昔日的热闹景象可以穿越时空的界限,自由想象。

据《永平志》载,“永平”二字的含义有四种说法:其一、元代为纪念东汉明帝“永平”中始置博南县的功绩,故以汉明帝年号“永平”二字为县名。其二、元代为安定社会秩序,故取名“永平”,寓意社会“永远安定太平”。

先秦属西南夷。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就设博南县,属永昌郡。“是为永平立县之始。”“博南”一词,系境内一座大山之名,因为博南山山势峻峭,绵延百里,是博南古道必经的重要山脉,故以山名,取名博南县。三国蜀汉属益州永昌郡,西晋至南北朝属南宁州永昌郡,北朝属南宁州,隋唐属南宁州总管府。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永平隶属匡州管辖,但时间不长,治所置于何处,亦无从考据。

虽然目前还没有文字记载,但不难推断永平最初的县衙,设在“普照寺”演变而来的现保存良好的原花桥村完小内,时间上从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开

祥云籍抗日将领 杨炳麟、肖本元

□ 胡子龙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救国中,在国民党阵营里,涌现出两个祥云籍抗战将领,一位是今云南驿镇的杨炳麟将军,另一位是今剑川厂镇的肖本元将军。

杨炳麟,1900年出生在云南驿镇云南驿村,18岁从军。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云南组织陆军第六十军开赴抗日前线,他任第六十军二八师一个团的团长,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等重大战役,尔后又率部转战赣北、奉新、安义等地,在江西大地上痛杀日寇。抗战功卓著,1941年被升任步兵第五旅旅长,1944年升任步兵第二十二师少将师长。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奉命率部开往越南境内受降。随后升六十军中将军长。

肖本元,长杨炳麟五岁,1895年出生于今剑川镇一个叫张厂的自然村,青年时在今云南省立中学考入云南省讲武堂,开始了他的从军生涯。1937年六十军从云南开赴抗日前线时,已经是团长的他,被擢升为六十军二八师五四一旅副旅长,参加了台儿庄战役,随后改任一八三师参谋长。1938年任旅长,率部在湖北阳新、排市一带与日寇作战。1942年升任五十八军新编第十师少将师长,在江西境内展开对日作战。日本投降后,随58军进南昌受降。

作为国民党阵营抗战将领,杨炳麟将军和肖本元将军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在日寇投降后的第三次国内战争也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二位将军并不像其它很多国民党将军一样,始终顽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直到被历史的潮流彻底抛弃,而是审时度势,顺应历史的潮流,积极和蒋介石集团划清界限,站到了人民的一面。1946年,蒋介石命杨炳麟将军率部六十军,开往东北准备内战,杨将军看清了蒋顽固进行内战的本质,不愿意当蒋进行内战的马前卒,于是借故请假回到了云南,在家闲赋一段时间后,到云南滇军中任职,1949年底随卢汉一起起义,积极推动促成了云南的和平解放。新中国时期,相继任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军官管理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预备学校军事教官、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常委、民革云南省委员会委员,直到1987年三月逝世,享年88岁。

肖本元于1947年在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全面内战中,已升任中将副军长的他,奉命率部开往南阳,准备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不料在中途就被解放军包围,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被俘后,经刘伯承、陈毅热情诚挚的教诲,他开始认识到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性,决心不再与人民为敌,释放回部队后积极策动起义,未果,随即离开部队回到云南家中,不久又在云南绥靖公署任参谋,1949年底随卢汉一道举行和平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后,在西南军区第二速成中队任军事教员,后转业到云南省文史馆任馆员,勤勉工作直到1990年逝世,享年95岁。

两位将军在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中毅然弃暗投明,为云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成为新中国光荣的建设者,是非常令祥云父老乡亲欣慰的。